

上海城市居民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

王甫勤

【摘要】上海城市居民的社会阶层结构是“金字塔”型还是“橄榄”型,在上海社会分层研究中仍有争议,而对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更是缺乏关注。文章依据公共权力、产权和市场能力3个维度将上海城市居民划分为6个社会阶层,并根据2008年“上海市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目前上海城市居民的阶层结构仍然具有典型的“金字塔”型特征,距离“橄榄”型社会结构仍有较大差距。文章通过对不同年代代际流动表的分析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父辈阶层地位和子辈阶层地位之间的关联度逐渐增强,并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出现了一定的边界,非技术工人和农业劳动者阶层跨越边界实现上向社会流动的难度较大,这一现象可能会给上海城市居民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带来一定的风险。

【关键词】上海城市居民 社会分层 流动模式

【作者】王甫勤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系,讲师。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经历剧烈变迁,社会结构也逐渐转型,社会阶层分化更加明显,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更加频繁。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城市经历了快速转型,人口、组织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动(李友梅等,2008)。但目前关于上海城市居民的社会分层研究,主要集中于中产阶层方面,对上海城市居民整体的社会分层结构及流动模式缺乏系统的研究。

从学者们对上海城市社会分层的研究来看,主要是以职业类别作为社会分层的基本标准,并形成了关于上海城市居民社会分层结构的两种基本观点,即“(亚)金字塔”型和“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仇立平(2001)认为,上海的社会阶层结构基本上是以职业地位为标准的“金字塔”结构,其最上层是“权力+财富阶层”,而最下层是无权无财的“普通大众”,根据职业地位指数高低划分的五大阶层(上上层、中上层、中间层、中下层、下下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分别为4.8%、7.5%、15.6%、9.0%、62.8%,如果将中下层中的商业从业人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课题重大攻关项目“中国目前社会阶层状况研究”(08JZD002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社会流动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研究”(11YJC840049)的资助。

员和下一层中的服务业人员归于一类,则上海城市居民的社会阶层结构呈明显的“(亚)金字塔”型特征。李友梅(2005)认为,衡量社会结构是否呈现“橄榄”型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职业结构中从事“白领”职业的人口比例超过50%;二是形成一定规模的中等收入者群体。在上海当代社会结构中,西方意义上的“白领”职业群体已达到50%,从总体上看,上海的社会结构已呈现“橄榄”型特征,即“中间大,两头小”。

综合来看,由于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的欠缺,学者们对于上海城市居民的社会分层研究主要以上海市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居民的阶层划分只能以统计局职业类别作为唯一标准。虽然职业分层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衡量人们在社会等级体系中的地位,与社会声望、权力和财富存在内在的关联,并且职业分层在操作上具有较大优势,但把职业作为分层标准时,掩盖了社会阶层分化的动力机制,也掩盖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冲突的根源。因此,要了解社会阶层分化的形式,就需要把握导致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根源。

二、上海城市居民阶层结构划分模式探讨

中国学者在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城乡社会阶层结构划分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陆学艺,2002;李路路,2003;李培林、张翼,2004;李强,2004、2008;孙立平,2006;郑杭生、李路路,2004),这些研究总体上概括了中国社会阶层不平等的状况,但这些研究或以西方社会分层为基础,缺乏对中国现实的关注,或以中国现实为依据,但分层框架较为宽泛,在实证研究中难以操作。刘欣(2007)从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构建了一个基于公共权力、产权和市场能力的城市社会阶层分析框架,对中国社会阶层状况的分析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本研究拟根据刘欣(2007)的阶层分析方法划分上海城市居民的社会阶层结构,主要操作逻辑如图1所示:(1)依据职业身份是否为干部将人们划分为两个基本类别,即享有公共权力的干部阶层和不享有公共权力的非干部阶层,以及享有公共权力较少或没有公共权力的行政办事人员及职员。(2)在干部阶层内部根据行政级别的高低再划分为局级及以上高层干部、处级中层干部、科级基层干部3个类别。(3)在非干部阶层内部根据是否拥有企业产权和资产控制权,划分为5个类别,即雇主阶层、经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对于前4个类别继续根据企业资产规模、管理级别、技术职称和有无技术进行细分。经过上述划分之后,上海城市居民最终被划分为14个阶层位置。下面将采用调查数据对这14个阶层位置进行分析和估计。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上海市委统战部2008年“上海市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该调查的对象2008年上海市符合劳动年龄(18~65岁)的非在学常住户籍人口,调查采用多段分层的概率抽样方法,运用结构式问卷收集资料,历时近两个月。调查地区包括黄埔、卢湾、徐汇、长宁、静安、普陀、闸北、虹口、杨浦、浦东、嘉定、金山、松江、崇明14个区(县),回收有效问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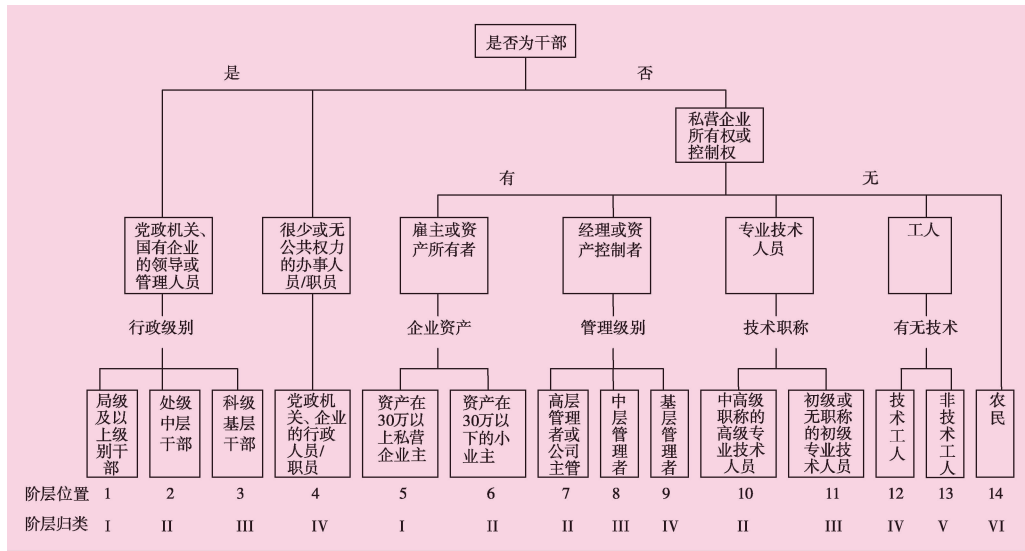


图 1 上海城市居民社会阶层结构划分框架

注：本图的原型来自刘欣(2007)对中国城市居民的阶层结构划分，由于操作化的差异，部分测量指标有所不同，但划分逻辑和原图基本保持一致。

5 000 份，本研究根据被访者的职业经历和当前职业身份剔除了“无工作”(477 人)、“军人”(4 人)和“无法分类的就业人口”(207 人)，最终获得 4 312 个样本。

(二) 分析变量

本研究从公共权力、产权和市场能力 3 个维度划分上海市居民的社会阶层地位，并研究父辈阶层地位和子辈阶层地位在不同时代的代际关联特征。公共权力根据是否为干部及其行政级别来测量；产权根据是否拥有私营企业及企业资产来测量；市场能力根据在市场化企业中的管理级别、技术职称和有无技术来测量。父亲社会阶层地位根据职业测量。为了控制年代效应，根据第一次参加工作的时间，将上海市居民分为 1977 年及以前、1978~1991 年、1992 年及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 3 个同期群。表 1 给出了本研究分析涉及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三) 分析模型

本研究利用对数线性模型和对数相乘模型(简称为流动表分析技术)来分析父子阶层地位的交叉流动表。对数线性分析不仅可以限制流动表行效应和列效应的影响，还可以根据理论假设对单元格进行相关限制。李煜(2008)将流动表分析技术概括为概括性取向的分析策略和分析取向的分析策略两大类型。本研究将根据概括性取向的流动表分析技术来研究上海城市居民的社会流动状况。在二维表分析中(以 Goodman RC II 模型为例)，对模型的设定为：

$$\log(F_{ij}) = \mu + \mu_i^R + \mu_j^C + \phi \mu_i v_j \tag{1}$$

其中， F_{ij} 是第 ij 单元格上的期望频数，其对数形式首先被分解成主效应(μ)、行效应(μ_i^R)和列效应(μ_j^C)三部分，这三者代表流动表中的边缘分布效应。 $\phi \mu_i v_j$ 是代际交互效应，是真正

表1 2008年上海市民生活状况调查样本情况描述(N=4312)

变 量	样本数	百分比	变 量	样本数	百分比
是否为干部			管理级别		
是	461	10.7	高层或公司主管	61	1.4
否	3851	89.3	中层	225	5.2
行政级别			一般	529	12.3
局级及以上	1	0.0	不适合	3497	81.1
处级	30	0.7	有无技术		
科级	187	4.3	有	406	9.5
一般科员	243	5.7	无	1576	54.0
不适合	3851	89.3	不适合	2330	36.5
企业资产			第一次参加工作		
30万元以下	5	0.1	1977年及以前	2214	51.3
30万元以上	26	0.6	1978~1991年	1281	29.7
不适合	4281	90.3	1992年及以后	817	18.9
技术职称			父亲职业阶层地位		
高级	49	1.1	中上层	414	10.4
中级	320	7.4	中间层	235	5.9
初级	298	6.9	中下层	535	13.5
无职称	167	3.9	非技术工人	1843	46.5
不适合	3478	80.7	农业劳动者	937	23.6

注:表中“不适合”表示不能按照该指标划分,只能根据其他指标划分。

性”; ϕ_k 代表对应国家或时期的“个性”。

四、上海城市居民阶层结构

笔者根据不同阶层所掌握资源的多少将图1中的14个阶层位置合并为6个社会阶层,分别是社会上层(I)、社会中上层(II)、社会中间层(III)、社会中下层(IV)、非技术工人阶层(V)、农业劳动者阶层(VI)。表2给出了各阶层规模及比例。社会上层包括行政级别为局级及以上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高层干部和私有资产在3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主,前者掌握较多的公共权力或公有资产的控制权,后者则掌握较多的经济资本,两者合计约占0.1%。社会中上层包括行政级别为处级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中层干部、私有资产为30万元以下的小业主、私营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分别掌握了较强的公共权力、经济资本、组织资源和人力资本,四者合计占总体的6.6%左右。社会中间层主要包括行政级别为科级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基层干部、企业中层管理者和没有职称或只有初级技术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拥有一定的公共权力、组织资源和人力资本,约占13.3%。社会中下层主要包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中没有行政级别行政办事人员或一般职员,企业的基层管理者和技术工人等,他们只拥有较少的公共权力、组织资源和人力资本,在刘欣(2007)分析框

代表阶层间流动机会差异的部分。 μ_i 代表父代职业阶层间的相对距离, v_j 代表子代职业阶层间的相对距离。 ϕ 被称为代际关联度,代表的是整个流动表的平均代际关联度。

在三维表分析中(以Goodman RCI 三维模型为例),对模型的设定为: $\log(F_{ij}) = \mu + \mu_i^R + \mu_j^C + \mu_k^L + \mu_{ik}^{RL} + \mu_{jk}^{CL} + \phi_k \mu_{ik} v_{jk}$ 。上式的主效应、行效应、列效应解释同式(1)。 μ_k^L 表示层(L)的效应。流动表的交互效应由 $\phi_k \mu_{ik} v_{jk}$ 项表述,其中 $\mu_{ik} v_{jk}$ 表示各个流动表相同的关联性、或相同的关联模式,代表各国或各时期的“共性”。

架中,被划入被支配者阶层,他们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占有重要比例,达到 1/3 左右。非技术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①则完全不拥有公共权力、经济资本、组织资源和人力资本,处于被支配地位,位于社会下层,二者比例分别为 40.9%和 5.1%。

根据表 2 所反映的社会阶层结构及六大阶层的相应比例,笔者绘制出上海城市居民阶层结构图(见图 2),从图 2 可见,上海城市居民阶层结构呈现出比较典型的“金字塔”型特征,位于阶层结构底端的是非技术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二者合计比例超过了 45%,中间阶层比例达到 53.8%,虽然超过总阶层规模的 50%,但依然不能判断上海城市的社会阶层结构是“橄榄”型的,因为社会上层的比例极低,没有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趋势。

五、实证结果分析

当前上海城市居民社会阶层结构存在明显的分化特征,但并不意味着上海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封闭或不平等的结构。对于社会阶层结构是否合理或开放的研究属于社会流动的研究范畴,通常根据代际社会流动来衡量。代际社会流动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父辈阶层地位和子辈阶层地位之间的代际继承程度(相关程度),以及这种相关程度和模式在不同国家或历史时期的变迁。本研究首先通过流动率的计算简单描述上海城市居民的社会流动特点,并利用流动表技术分析(不同时期)社会阶层之间的边界。

(一) 上海城市居民的社会流动率分析

表 3 是根据父辈和子辈阶层地位形成的 5 × 5^②列联表,对角线位置表示父子社会阶层

- ① 由于本研究的调查范围除了上海市区之外,还包括了嘉定、金山、松江与崇明等远郊区县,因而样本中含有一定比例的农业劳动者。
- ② 由于社会上层人数和所占比例在总样本中较低,所以将其并入社会中上层,以减少分析误差。单元格中有 3 个数值,第一个数值(如 52)表示对应单元格的频次,第二个数值(如 12.6%)表示行百分比,是依据父辈地位边缘和计算的百分比;第三个数值(如 18.7%)表示列百分比,是依据子辈地位边缘和计算的百分比。

表 2 2008 年上海城市居民阶层结构与规模

阶层位置	阶层归类	频数	百分比
局级及以上	I	1	0.0
处级	II	30	0.7
科级	III	187	4.3
无级别	IV	791	18.3
30 万元以上的企业主	I	5	0.1
30 万元以下的小业主	II	0	0.0
企业高层或公司主管	II	20	0.5
企业中层	III	100	2.3
企业基层	IV	304	7.1
中高级职称	II	235	5.4
初级职称及无职称	III	287	6.7
技术工人	IV	368	8.5
非技术工人	V	1764	40.9
农业劳动者	VI	220	5.1
总计		4312	100

资料来源:2008 年上海市民生活状况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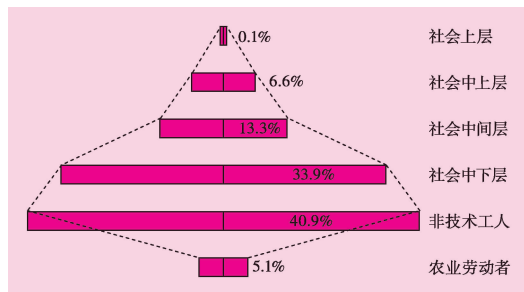


图 2 2008 年上海城市居民阶层结构

表3 2008年上海城市居民代际社会流动

父辈地位	子辈地位					合计
	社会中上层	社会中间层	社会中下层	非技术工人	农业劳动者	
社会中上层						
单元格频次	52	72	170	118	2	414
行百分比	12.6	17.4	41.1	28.5	0.5	100.0
列百分比	18.7	13.8	12.6	7.3	1.0	10.4
社会中间层						
单元格频次	21	42	78	86	8	235
行百分比	8.9	17.9	33.2	36.6	3.4	100.0
列百分比	7.6	8.1	5.8	5.3	3.9	5.9
社会中下层						
单元格频次	50	100	204	175	6	535
行百分比	9.3	18.7	38.1	32.7	1.1	100.0
列百分比	18.0	19.2	15.1	10.8	2.9	13.5
非技术工人						
单元格频次	102	217	654	848	22	1843
行百分比	5.5	11.8	35.5	46.0	1.2	100.0
列百分比	36.7	41.7	48.5	52.6	10.8	46.5
农业劳动者						
单元格频次	53	89	243	386	166	937
行百分比	5.7	9.5	25.9	41.2	17.7	100.0
列百分比	19.1	17.1	18.0	23.9	81.4	23.6
合计						
单元格频次	278	520	1349	1613	204	3964
行百分比	7.0	13.1	34.0	40.7	5.1	100.0
列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地位相同,未发生社会流动或发生水平流动,非对角线位置则表示父子社会阶层地位不同,发生了社会流动,对角线下方表示发生了上向流动(父辈地位低于子辈地位),对角线上方表示发生了下向流动(父辈地位高于子辈地位)。根据表3计算,当前上海居民总的流动率为66.90%,上向流动率(48.3%)远高于下向流动率

(18.6%)。总的社会流动率与1999年上海调查数据基本持平^①(仇立平,2001),稍高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64.1%的社会流动率,接近美国20世纪70年代初期68.1%的社会流动率水平(许嘉猷,1989)。但总的社会流动率不能完整地反映社会结构的开放性程度,早期社会学者们通过结构流动来测量社会结构的变迁,用循环流动来测量社会结构的开放性程度。结构性流动通过父子两代职业的边际分布的差异系数来计算,公式为:

$$\text{结构流动率} = \Delta(I.D.) = \frac{1}{2} \sum_{i=1}^n |x_i - y_i| \quad (2)$$

根据式(2)计算,当前上海居民的结构流动率约为27.65%,约占总流动率的40%,循环流动率约为39.2%。说明当前上海居民的社会流动大约有40%是由于社会整体结构变迁所

^① 由于调查数据收集的方法和阶层划分的方法不同,二者并不具有实质的比较意义。

引起的。虽然三者总的流动率非常接近或类似,但从循环流动率来看,三者的社会结构开放度却有着较大的差异,上海居民当前的社会流动水平介于二者之间。比台湾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26.0%)高,比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49.3%)低。从父子两代阶层地位的边际分布来看,社会中上阶层的比例下降了 3.4 个百分点,非技术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分别下降了 5.8 个百分点和 18.5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社会中间阶层和社会中下层的比例则出现了较快的增长,分别增加了 7.2 个百分点和 20.5 个百分点。说明位于社会阶层结构两端的比例有所下降,而中间阶层的比例有所增加,社会结构变迁更加趋向合理化。

由于流动率的计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边际分布的影响,这些百分比并不能衡量父辈社会阶层地位和子辈社会阶层地位之间的关联程度。因而本研究继续采用对数线性模型和对数相乘模型对表 3 的数据进行模拟,为了区分不同年代父子阶层地位之间的关联效应,本研究在表 3 中加入了时间维度(被访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通过三维表分析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父子阶层地位之间关联性的变化趋势。

(二) 上海城市居民的流动模式分析

二维表模型和三维表模型分别以独立模型和条件独立模型作为基准模型,然后分别加入对角线参数、行效应、列效应、交互相应等相关参数。模型运用 Lem 软件进行计算,拟合结果如表 4 所示。

在所有二维表模型中,模型 1-8 的 p 值最大($p=0.192>0.05$),说明模型已足够拟合数据,但模型 1-8 的 BIC 值及自由度与其他模型相比,BIC 值比模型 1-3 高,且消耗自由度更多,表示模型 1-8 不是一个简约的模

表 4 上海城市居民社会流动模式及不同时代代际流动特征分析模型(N=3964)

模型说明	df	L ²	p	BIC
二维表				
1-1 独立模型	16	441.48	0.000	308.9
1-2 单一相关模型	15	272.59	0.000	148.3
1-3 单一相关对角线模型	10	36.7	0.000	-46.1
1-4 行效应对角线模型	7	23.9	0.001	-34.1
1-5 列效应对角线模型	7	29.1	0.000	-28.9
1-6 行列效应对角线模型	4	12.6	0.013	-20.5
1-7 行列效应相等对角线模型	7	21.2	0.003	-36.8
1-8 行列效应相乘对角线模型	4	6.1	0.192	-27.0
1-9 同等行列效应相乘对角线模型	7	21.2	0.004	-36.8
三维表				
2-1 条件独立模型	48	492.2	0.000	94.5
2-2 同质对角线独立模型	43	115.3	0.000	-240.9
2-3 条件准独立模型	33	103.8	0.000	-169.6
2-4 同质单一关联对角线模型	42	73.5	0.002	-274.4
2-5 异质单一关联对角线模型	40	66.2	0.006	-265.2
2-6 同质行效应对角线模型	39	62.7	0.009	-260.4
2-7 异质行效应对角线模型	31	44.0	0.061	-212.8
2-8 同质列效应对角线模型	39	65.1	0.006	-258.0
2-9 异质列效应对角线模型	31	50.5	0.015	-206.3
2-10 同等行列效应模型 I	39	57.6	0.028	-265.5
2-11 同等行列效应模型 II	37	42.4	0.251	-264.2
2-12 行列效应对角线模型	34	24.6	0.882	-257.1

注:模型的拟合优度主要通过 L² 和 BIC 来比较,L² 和 BIC 值越低,表示模型拟合效果较好。由于 BIC 值同时考虑了 L²、自由度和样本数三者来计算模型的拟合优度,其应用范围更加广泛。本研究也主要以 BIC 值来作为判定模型拟合程度的主要标准。

型,因而本研究选择模型 1-3 作为上海城市居民代际社会流动的最终解释模型。模型 1-3 是单一相关对角线模型,在模型 1-2 的基础上增加了对角线参数,该模型假定列联表行和列均按等级次序排列,且相邻类别之间的距离相等,还假定对角线位置与非对角线位置的流动模式不同,模型使用 1 个参数来估计行与列之间的相关,也即父辈阶层地位和子辈阶层地位之间的关联性强度,该相关系数的估计值 $\Phi=0.119$ 。

(三) 不同时期上海城市居民流动模式的变迁

根据上述三维表模型的比对,本研究认为异质单一关联对角线模型(模型 2-5,即在模型 1-3 的基础上增加关于不同时期父子地位关联强度不同的假定)是不同年代代际流动的最优拟合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三维表进行效应估计(见表 5)。统计结果显示,不同年代

表 5 异质单一关联对角线模型对不同年代代际流动表的参数估计

效应	社会中上层	社会中间层	社会中下层	非技术工人	农业劳动者
行效应 μ_i	-0.328	-0.933	-0.063	1.030	0.294
列效应 ν_j	-0.122	0.383	1.353	1.282	-2.895
对角线效应	-0.124	0.084	0.026	0.165	2.620

父辈地位和子辈地位之间的关联强度有明显差异,对于改革开放之前就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来说,父辈地位

对子辈地位的影响最小,关联程度只有 0.088,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深入,父辈地位对子辈地位的影响有所增强,对于 1978~1991 年之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而言,代际地位的关联强度增加到 0.115,在 1992 年及以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来说则增加到 0.191,这种逐渐增强的趋势,是否意味着存在阶层固化的潜在趋势?需要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从行效应来看,当前上海城市居民的阶层边界主要存在于社会中上层、社会中间层、社会中下层与非技术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之间。社会中上层、中间层、中下层之间的相互流动较为容易,非技术工人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之间的相互流动也较为容易,但其跨越阶层边界上向流动到社会中下层、社会中间层和社会上层的难度则相当大。从列效应来看,农业劳动者几乎不能够从其他阶层获得补充,社会中下层和非技术工人阶层之间相互补充的程度最高,社会中上层和社会中间层从其他阶层获得补充的可能性较高。从对角线效应来看,无论是在哪个年代,农业劳动者和非技术工人的继承度(分别为 2.620 和 0.165)较高,社会中上层的继承度最低(-0.124),社会中间层和社会中下层的继承度也相对较低,这也说明了非技术工人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与社会上层、中间层、中下层之间存在阶层边界的可能性。

六、结 语

研究采用 2008 年“上海市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当前上海城市居民的社会阶层结构依然保持着典型的“金字塔”型,社会上层人口比例较低,而非技术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组成的社会下层人口比例较高,中产阶层比例虽然超过总数的一半,但其中大部分以社会中下层为主,整个社会与“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仍然有一定距离。从总体上看,目前上海城市居民总的社会流动率较高,约有 2/3 左右的阶层人口都发生了社会流动(不包括水平流动),稍高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台湾地区的社会流动水平,并接近美国

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社会流动水平。但是,在上海城市居民的代际社会流动中,有近四成是由于整体社会结构变迁所引起的结构性流动,也就是说,上海当前实际的社会结构开放程度可能还没有达到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

本研究运用流动表分析技术,根据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将当前上海城市居民的代际流动划分为3个阶段,通过异质单一关联对角线模型分析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父辈地位和子辈地位之间的关联性强度并未出现递减趋势,反而出现了递增的趋势(虽然总体强度不是很高),从阶层关系来看,中上层、中间层、中下层与非技术工人和农业劳动者阶层之间有一定的阶层边界,非技术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的继承度较高,他们上向流动到社会中下层、中间层、中上层的难度越来越大。但从阶层成员补充的角度来看,社会中下层和非技术工人阶层之间的相互补充程度较高。说明在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过程中,由于城市化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但他们只能从事一些非技术工作;而产业结构升级也使相当一部分非技术工人进入一般企业单位,从事行政人员或办事人员工作,跨越阶层边界,进入了社会中下阶层。总体来看,上海城市居民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在经历“金字塔”型结构向“橄榄”型结构的社会转型,但从目前趋势来看,这种转型尚处于起步阶段。

参考文献:

1. 李路路(2003):《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李培林、张翼(2004):《中国的消费分层:启动经济的一个重要视点》,载于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 李强(2004):《转型期中国社会分层》,辽宁教育出版社。
4. 李强(2008):《社会分层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李友梅(2005):《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社会学研究》,第6期。
6. 李友梅等(2008):《上海社会结构变迁十五年》,上海大学出版社。
7. 李煜(2008):《社会流动的研究方法:指标与模型》,《社会学》,第4期。
8. 刘欣(2007):《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定位》,《社会学研究》,第6期。
9. 陆学艺(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0. 仇立平(2001):《职业地位:社会分层的指示器——上海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11. 许嘉猷(1989):《台湾代间社会流动初探:流动表的分析》,载于伊庆春、朱瑞玲主编:《台湾社会现象的分析》,“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
12. 孙立平(2006):《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3. 郑杭生、李路路(2004):《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 犁)